

· 民国学术经典文库 ·



東方出版社

目 次

序	(1)
例 言	(1)
导 言	(1)
明义第一	(6)
(一) 词之意义	(6)
(二) 曲之意义	(10)
(三) 词曲之界	(13)
溯源第二	(15)
(一) 汉魏乐府	(19)
(二) 南北朝乐府	(23)
(三) 隋唐乐府	(30)
具体第三	(35)
(一) 唐代词体之成立	(36)
(二) 唐五代诸词家	(68)

衍流第四	(89)
(一) 宋初乐曲之概况	(89)
(二) 北宋慢词之渐兴	(96)
(三) 南宋词之极盛	(110)
(四) 两宋词流类纪	(116)
析派第五	(141)
(一) 北宋诸词家	(142)
(二) 南宋诸词家	(168)
(三) 金诸词家	(199)
构律第六	(208)
(一) 调谱	(209)
(二) 韵协	(238)
(三) 四声	(246)
(四) 五音	(249)
启变第七	(253)
(一) 由词入曲之初期	(254)
(二) 宋金戏曲之肇衍	(272)
(三) 元代戏剧之完成	(277)
(四) 元曲本及其作家	(286)
(五) 元诸词家	(325)
入病第八	(345)
(一) 明代词学及其作家	(346)
(二) 明代曲学	(363)
(三) 明曲本及其作家	(369)
振衰第九	(379)
(一) 清代词学之振兴	(380)

(二) 清诸词家	(391)
(三) 清代戏曲之盛衰	(424)
测运第十	(439)
(一) 词曲之现状	(440)
(二) 词曲之前途	(447)
后 序	(450)

编选说明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 38 年，史称民国时期。与政治经济衰败不相对称的是民国学术大放异彩，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继承、整理，西方文化高强度地影响着当时学人的思维和视野，一时间著述兴盛、流派纷呈。为保存、借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促进当今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研考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同时使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更见系统性，我们编选了这套《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考虑到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时代学术发展轨迹和现今出版状况，我们的编选工作按如下要求进行：

1. 入选范围为 1911 年辛亥革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中国学人发表的重要学术著作；个别作品虽初版于辛亥革命前（如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

导 言

东西诸国，文化各殊，溯其渊源，每由民族质性之有偏，居处环境之互异，用是演进，各展所长，经时既遥，遂岐趋尚。西方种族国密，待竞而存，生生所资，无敢暇逸，理智所注，科学兴焉；中华地大物博，闭关自足，历岁数千，同文一贯，情感所凝，文学尚焉。夫文学公物也，亦文化之果也，有文化者即有文学，宁独中国？虽然，事有偏胜，物有特征。文学者，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西国未尝无文学，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修养未若中国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此无可逊也。然则吾人姑谓中国文学甲于坤舆，殆非过矣！

虽然，国人之嗜于文学也亦甚矣！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迄于清，举凡文士才人所毕生萃精力而为之者，何莫非文学哉？其为类也，有散，有骈，有韵律；其为体也，有文，有赋，有诗词歌曲。任举一端，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当。则妨生事，阻普化，非文学之本意也。然而业无幸成，功无虚牝，力之所及，效

则致焉。苟时方丧乱，尚申、商之法，右孙、吴之谋，用苏、张之策，抑文黜学驱民以归于惨礉苟营之涂，斯已矣；如其不然，欲养和平康乐之风，存温柔敦厚之教，使心声所播，文采所敷，濡染弥漫，蔚成国华，则艺不厌精，心无求暇。盖文章政事，分道扬镳，纵未兼长，无妨并进。使持功利之见，杂诸性情之间，行见顾忌迁就，无有已时，而支绌寥落，可立待矣。故恶高美之文学者，不必言文学，揭简易以为倡者，不足言文学。

所谓文学之优劣，果以何为标准乎？征诸中西论文者之语，可以睹矣。西方之论文，恒以读者之赏鉴为准，其重在外缘；中国之论文，则以文章之本质为准，其重在内美。波斯奈谓“文学志在取悦于大多数人”；而杜甫乃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赫德森谓“文学论情述理，对大多数人类生兴趣”；而昭明太子乃云“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梁元帝更云“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察其所揭之帜，则其内外轻重之不同明矣。故中国文学，惟务充内美，而不计外缘，其得在高超，而失在不普；西方文学，务容悦当时，趋附风尚，其利在广被，而弊在委随。此亦中西人性之殊，而文学根本之歧点也。

文章之内美，约四端焉：曰理境也，情趣也，此美之托于神者也；曰格律也，声调也，此美之托于形者也。托于神者，为一切文体所同需，托于形者，则诗词曲所特重也。理境高矣，情趣丰矣，无格律声调以调节而佐达之，犹鸟兽之不被羽毛也，犹人体之不著冠服也，犹舞无容而乐无节也。虽自矜其精神之美，何济焉？《诗序》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沈约云：“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

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则格律声调之重，昔人固论之周已。

昔季札观乐，闻声而识其国风。《诗》三百篇，大率可被之弦管。故班固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夫声不谐则乐不叶，欲咏其声何由乎？故诗歌之与格律声调，源固并也。汉魏乐府，置协律之官；隋唐登歌，传坐立之伎。乐日盛矣。然太白《清平调》香山《杨柳枝》，本属绝诗，却开词脉。自时厥后，诗乐并兴。词则应运而生汇流而大。于是格律声调，尤重于诗歌矣。

或曰：词曲之事，亦仅于抒情而已，乃至侔色揣称，刻羽引商，词调数百，曲体千余，得无有玩物丧志之患乎？曰：人心情态，何啻万千！声本乎情，自然殊致。如其挚情流露正赖声律，以成抑扬动静刚柔燥湿之观。譬之五服六章，纵异布絮之功，能资黼黻之美，苟非墨翟之非乐责俭，孰能拒而斥之哉！自唐以降，作者千数，岂尽愚蒙？何以不惮烦劳，行兹艰阻？岂不以宝藏所存，靡躯无惜，不为其易者，正欲达其深耳！

或又曰：抒情之道，岂必词曲哉？方今欧化东渐，新潮日长，创无韵之诗，行自然之体，未尝不足以抒情。居今日而盛谈格律最严，声调最复之词曲，得无贻章甫适越之诮乎？曰：人不能乐，不害其为人；士不能吟，无伤其为士。聋者无以与夫钟鼓之声，然遂欲铩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自盖其不聪，不可也。文学者，学之专门者也；词曲者，又文学之专门者也，专门之事，不能责之众人；然而百夫之所不能扛者，乌获可一臂而胜，无害也。无韵自然之诗，不禁人为；欲遂扫其固有之美，强天下而尽从其后，于势亦有所不可能矣。

今述词曲史，其事有三难：一，昔人言词曲者，率重家数，而鲜明其体制源流也；二，词曲宫调律格，至为复杂，言之不能详尽也；三，词曲之界混，后人不能通古乐，无以直捣奥窔也。兹惟旁稽群籍，折衷事理，区为十篇，撮述于次：

为学务先正名，名正则学之条理可具。矧词曲上承于诗，旁通于赋，下流于歌剧盲辞，其质难明，其界易混。不有以揭之，曷从而辨之！述《明义第一》。

事无突如，物不骤至。欲抽其理，必探其源。词曲各具封疆，领域颇广。宋元以降，卓焉大声。穷其所自，各有根本。裒索列举，务观其通。述《溯源第二》。

唐代声色冠绝，士耽骚雅，众习宫商，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词体之立，实肇斯时，五季更迭，百度废弛，人文凋敝，独词则洋洋大观。述《具体第三》。

有宋龙兴，文风大畅。倚声之道，习焉为常。自理学名臣，才人志士，缁羽闺阁，巨佞神奸，皆擅胜场，各具面目。佳篇伟作，发数尤难。词学至此，若决江河。述《衍流第四》。

北宋全盛，词苑辉煌。晏，欧，柳，苏，贺，秦，周，李，并挺英哲，以佐元音。南渡中衰词人抑塞。辛，姜，吴，史，王，蒋，张，周，或见江左风流，或感西周禾黍，列而论之。述《析派第五》。

诗律宽放，词则倍严。调既陆离，韵复纷杂。四声既别，五音益分。剖析毫厘，咀嚼微妙，语其组织之密，实无匹伦。浅学者感其难；而深好者领其味。述《构律第六》。

词体层出，流变渐乘。北宋大晟，已开乐府。转踏，大曲，宫

调，赚词，递衍递繁，遂成曲体。金元以降，南北并趋，结族之交，探索最难。苟非别详，不足指信。述《启变第七》。

物盛必衰，理所应具，宋元词曲，至明渐芜。高，刘，瞿，李，尚有正声；乃及杨，王，强作解事。歌剧亦逊胡元，虽有名篇，或舛声律。述《入病第八》。

胜清人文，自然淳焉，曲苑词坛，备臻上极。词则朱陈竞响，曲则洪孔飞声。末季格调益高，订勘尤密，古华烂发，坠绪能明。但歌剧中衰，伧声代作耳。述《振衰第九》。

士困于学，文患其难。趋势所归，似缛丽之词，在所必扫。然美不自灭，情有同然。情苟欲舒，美应无缺。词曲浩博，无美不臻，历世弥光，可以操券。述《测运第十》。

明义第一

欲明词曲史，当先明词曲之义。顾词曲之义亦难明矣。盖吾国历史，亘世过长，名物之立，往往一字数义，一物数名。非推其本末，辨其通专，不足以详其性质范围也。即如词曲二名，人皆知为唐，宋，金，元间之二种新文体矣，苟粗言之，亦曰词曲已耳。何待别明其义乎？然词曲之名，含义甚复，界限甚宽；非必唐宋间之所谓名词，金元间之所谓名曲也。且方曲未兴，词亦泛称为曲；迨曲既盛，曲又广称为词。（说详后）又就词而言：有称诗余者矣；有称乐府者矣；有称长短句者矣。就曲而言：有称杂剧者矣，有称院本者矣；有称传奇者矣；有称散曲者矣。是词曲犹非定名，夫何由而断之？今惟先释二者之义，继明二者之界焉。

（一）词之意义

自来释词字之义者，每好征引《说文》意内言外之训，然许

氏初非为此立名，而其字实不专属此唐宋间之一种文体之称也。词，《说文》作「讎」，从司言，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上「司」下「言」者，内外之意也；（从段氏说）词字则为其隶行。（郭忠恕《佩觿》）今假之为此种文体之名，亦不过化通称为专称耳，非其义遂足以专明此一种长短句之近体乐府也。夫意者，文字之义；言者，文字之声；词者，文字声义之合也。举凡摹绘物状，发声助语之文字，皆以词为通称。乃欲据以训此千年之后特出之一种文体，得无牵强？故吾人但名此种文体为词可矣，不必上追许说，攘通称为确诂也。（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五有论及此者，略谓“夫意内言外，何文不然？不能专属之长短句。盖乾嘉以来，考据盛行，无事不敷以古训，填词者遂窃取《说文》以高其声价。”见顓通核。）至词之异名有诗余、乐府、长短句等，分释如次：

（甲）诗余——诗余之名，不详所自始。《蜀中诗话》云：“唐人长短句，诗之余也，始于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集，故谓之《草堂诗余》。”似诗余之名即出于此。然《草堂诗余》为南宋人所编选，而北宋廖行之词，已名《省斋诗余》，则其名固早立矣。大致谓古诗变为乐府，乐府又变为长短句，故以词为诗之余。而清毛先舒谓：“填词不得名诗余，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余。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余。楚《骚》不得名经余也。……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余哉？”汪森谓：“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吴应和则谓：“金元以来，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余所独也。顾世称诗余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余为安。”而近人王以慤释之云：“非五七言之余，

三百篇之余也。”如是而词之位置始得比于诗。然而“余”之为言，究未惬当也。宋元人词集以诗余名者，有廖行之《省斋诗余》，吴则礼《北湖诗余》，仲并《浮山诗余》，韩元吉《南涧诗余》，王之望《汉滨诗余》，李洪《芸庵诗余》，张榦《南湖诗余》，许棐《梅屋诗余》，吴潜《履斋诗余》，汪莘《方壶诗余》，韩淲《洞泉诗余》，汪晫《康范诗余》，黄机《竹斋诗余》，林淳《定斋诗余》，王迈《臞轩诗余》，赵孟坚《彝斋诗余》，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柴望《秋堂诗余》，吴存《乐庵诗余》，赵文《青山诗余》，刘诜《桂隐诗余》，刘壎《水云村诗余》，黎廷瑞《芳洲诗余》，刘将孙《养吾斋诗余》，舒頔《贞素云斋诗余》，舒逊《可庵诗余》等。亦可见习用其名者之众矣。

(乙) 乐府——乐府之名，始于西汉，盖教乐之官也。于殷曰瞽宗；周因殷列为西学，所以教礼乐，《周官》有大司乐之属；至汉文帝以夏侯宽为乐府令，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而立乐府，始具乐府之名。自汉迄唐，凡郊祀，燕射，鼓吹，清商，舞曲，琴曲等，悉属乐府范围，然不必尽施于乐。刘勰所谓“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是也。唐人乐府，初循汉魏小乐府五言，若《子夜》，《欢闻》，《前溪》，《读曲》诸歌；继循齐梁乐府七言，若《挟瑟歌》，《乌栖曲》诸辞。故其体率为绝句，如《纥那曲》，《怨回纥》，皆五绝也；《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欸乃曲》，皆七绝也。是即乐府，亦即词也。故宋元人遂沿称词为乐府。其集之以乐府名者，有苏轼《东坡乐府》，贺铸《东山寓声乐府》，周紫芝《竹坡居士乐府》，徐伸《青山乐府》，刘弇《龙云先生乐府》，赵长卿《惜香乐府》，康与之《顺庵乐府》，曹勋《松隐乐府》，姚

宽《西溪居士乐府》，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杨冠卿《客亭乐府》，杨万里《诚斋乐府》，赵以夫《虚斋乐府》，段克己《遯斋乐府》，段成己《菊轩乐府》，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元好问《遗山新乐府》，王义山《稼村乐府》，王恽《秋洞乐府》，陈深《宁极斋乐府》，曹伯启《汉泉乐府》，周权《此山先生乐府》，蒲道园《顺斋乐府》，虞集《道园乐府》，许有壬《圭塘乐府》，宋絅《燕石近体乐府》，张埜《古山乐府》等，皆其类也。

(丙) 长短句——长短句即乐府之杂言者也。周《颂》汉《歌》，已启其源。天籁所发，初无定谱，低昂合节，错落不齐，要以表其变化之美。汪森谓“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六朝以还，歌行杂作。至于唐代，厥体盛兴，李白《蜀道难》，《长相思》，《将进酒》等篇，极参差变化之致。及张志和白居易辈割五七言而为《渔歌》《忆江南》等，词体于是乎成，而此后之长短句，皆倾向于词矣。王昶谓“诗本于乐，乐本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故宋元多称词为长短句，其集之以长短句名者，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陈师道《后山长短句》，米芾《宝晋长短句》，赵师侠《坦庵长短句》，左誉《筠庵长短句》，张纲《华阳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刘克庄《后村长短句》，李齐贤《益斋长短句》等，皆其类也。

此外有称歌曲者，如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称琴趣者，如黄庭坚《山谷琴趣》，晁端礼《闲斋琴

趣》，赵彦端《介庵琴趣》；有称乐章者，如柳永《乐章集》，刘一止《苕溪乐章》，洪适《盘洲乐章》，谢懋《静寄居士乐章》；有称遗音者，如石孝友《金谷遗音》，林正大《风雅遗音》，陈德武《白雪遗音》。余如朱敦儒之《樵歌》，陈允平之《日湖渔唱》，周密之《苹洲渔笛谱》，张辑之《东泽绮语集》，杨炎正之《西樵语业》，高观国之《竹屋痴语》，皆喜为异名，而化去词之本意，无深义也。

(二) 曲之意义

曲主可歌，唐宋词皆可歌，词与曲一也。自有不能歌之词，而能歌者又渐变为曲，则宋元间之所调曲也。而曲之源实起于汉，乐府《铙歌鼓吹》之类是也。《古今乐录》载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又《鼓吹铙歌》十八曲；《晋书·乐志》载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又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又晋武帝令傅玄制《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其所有曲题，皆未明称为曲也。及宋《鼓吹·铙歌》有《上邪曲》，《晚芝曲》，《艾如张》曲，始著曲名。自后乐府歌辞，多以曲名篇，其源流当别详。而究曲字之义，则音韵曲折之意也。按《汉书·艺文志》，载《河南周歌诗》，《周谣歌》，皆有声曲折。又《宋书·乐志》，载张华表云：“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又载贺循云：

“自汉以来，自造新诗。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所谓曲折者，殆即曲字之所由得名也。明徐师曾《诗体明辨》云：“高下长短委曲以道其情者曰曲。”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音声杂比高下短长谓之曲。”为意亦同。至宋代之曲，则昉自隋以后之曲子。宋王灼《碧鸡漫志》云：“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自是有大曲，有法曲，有北曲南曲，递衍递变，虽为体各异，而统以曲名，要以被之声歌音韵曲折为主。特金元以后，则专以其名属之戏曲耳。曲之异名，有杂剧，院本，传奇，散曲等，亦分释如次：

(甲) 杂剧——两宋戏剧均谓之杂剧。《宋史·乐志》云：“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宋吴自牧《梦粱录》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周密《武林旧事》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组织内容，盖合大曲法曲宫调词调为之，而又穿插种种滑稽杂戏及故事，而杂剧遂为其总名。元代仍因其名而略变其体质，遂成元之杂剧。变叙事体为代言体之戏剧，亦由是托始。迨明以后，则又以戏曲之短者为杂剧矣。

(乙) 院本——杂剧至金，始有院本之名，盖行院之本也。行院者，金元人谓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谓之院本。元陶九成《辍耕录》，载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种，有《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目。又有所谓爨或焰段者，亦院本之异名也。《辍耕录》又云：“金有杂剧院本诸宫调，院本杂

剧，其实一也，国朝始厘而二之。”所谓厘而二之者，盖以元人创杂剧，而称金之旧剧为院本也。然至明初，已有称元杂剧为院本者。自后遂混北剧或南戏而泛称院本矣。

(丙)传奇——传奇之名，昉自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属小说，无关曲也。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碧鸡漫志》所谓“泽州孔三传首唱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此非元人之杂剧也。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人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故传奇之名凡四变；普通所指，乃元之南戏，明之戏曲耳。

(丁)散曲——散曲对剧曲而言。剧曲纪事必具首尾，率以科纪动，以白助言；散曲则无论纪事写景状物言情，皆不须科白相联贯，故又名清曲。其中更分小令散套二种：小令一名叶儿，为散曲之短小者，对体制较大之套曲而言；散套一名套数，为散曲之成套者，对有联贯之剧套而言。元明人亦多称散曲为乐府，如杨朝英之《太平乐府》，郭勋之《雍熙乐府》诸选集，张可久《小山乐府》，周宪王《诚斋乐府》，王九思《碧山乐府》，杨慎《陶情乐府》诸别集。意谓其曾经文学之陶冶，可以入乐府而充一代之雅乐，有以别乎里巷之俚歌，然与词之称乐府者几混矣。

此外又有称曲为词余者，然名实未当也。谓词为诗余，犹可曰诗不指五七言，乃三百篇耳。今以曲为词余，宁非抑曲过甚欤？盖文体流变，各辟疆宇，无所谓余。如别子为祖，遂不更与本宗论系属也。况词曲门户各殊，势力相等，作者各擅专长，不相取下，安见此遂为彼之余邪？